

人物背景

农加贵,1986年至今独自坚守在麻风村小学教书育人,近年来先后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全国“最美职工”、云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2015年被文山州人民政府授予“文山州先进工作者”称号。

题记

从弱冠之年到知天命的季节,在一所以“麻风村”为标志性符号的小学,他31年来只身教过102个孩子——他叫农加贵。



“落松地啊,请你听我说”

——记“全国最美职工”农加贵

“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那顿晚餐”

碗筷是刚买回来的,全新。

满满一桌饭菜散发着香味,尤其那碗刚从熊熊柴火铸铁锅里铲出来的腊肉,热气腾腾,油光透亮,香味逼人。

对于1992年尚属很困难的云南省广南县农村,置办这桌丰盛的菜肴还是很破费的,它是招待贵客的标准。

村长的面容很和蔼,他手上拿着筷子,笑眯眯地看着客人,但就是不动,他要等农加贵和农炳康这两位客人先动筷,客人动过的菜碟,村长一家就不会再动了。

尽管细如此,但农加贵心里还是忐忑极了,不怎么搛菜,他不敢动筷,低着脑袋一个劲儿地喝水。

在麻风病人家吃饭,这是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今儿真切发生了,农加贵内心深处甚至有些后悔,“为什么要答应留下吃饭呢?”可是现在骑虎难下,走,肯定不行了,只有硬着头皮坐下吃,但愿上天佑佑不要意外,别染上病。

和皮肤病防治站的“医生”在一起混了6年,他已经大略知道麻风病传染的途径了,饮食,就是其中的一种。

如果没有“医生”农炳康陪同,他今天打死也不敢留下吃这顿饭,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印象最深,吃得最艰难的一顿饭。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

时隔25年后,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簇新,“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水,因为之前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

“我当时还是很害怕。”

时隔25年后,农加贵说起1992年夏天这顿晚餐依旧记忆簇新,“我尽量不吃菜,尽量喝水,因为之前医生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可以防麻风病。”

“其实,这顿晚餐他无法拒绝。

就在这天下午,他从广南县城第五中学招生办抄回来了“落松地小学”全部10个学生“小升初”的考试成绩,那年参加考试的学生,最高的206分,最低135分,10个孩子全部超过115分的录取线而升入初中。

这是他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且100%考上了中学。

他到落松地小学第一批所教的学生有12个,读到三年级时,转学了两个。

村长高兴得近乎发狂,这是他们村打1957年建立以来,到1992年整整35年,第一次有学校,第一次有孩子读书毕业并且取得好成绩。

饭菜摆上饭桌了,村长说:“反正我知道你们为难,碗筷都是新的,你们喜欢吃什么就自己搛,我不给你们搛菜。”

这顿饭吃了没过多久,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皮肤过敏,农加贵身上发痒,“一想到在村长家吃过饭,身上更痒,坏了,是不是染上那个病了?”

他脱光衣服倏地跳进学校下面的那条小河,“拼命揉搓身体,把皮肤都搓红了,搓疼了,我害怕我感染上麻风病。”

农加贵回头把身上痒痒的事和“医生”农炳康说了,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农炳康建议他使用酒精;“别怕,没事,你要害怕就用酒精擦一下。”

酒精是这个“医院”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说不害怕是假话,”回忆当初在村长家吃饭,他说,“我是真害怕,又不敢说出来。”

能否留下吃饭,对于这个以麻风病在方圆百里出名的村庄来说,是极端重要的,留下,说明尊重并信任他们;不留,说明来者和外面的人一样,骨子里对他们充满了基于恐惧的抵抗和歧视。

或许,村长那天挽留农加贵在家吃饭,也是想借此机会打量这个当时仅25岁的年轻人是否信任他们的一种试探。

渐渐地,农加贵胆子大了,“以后我就经常到他家吃饭了,他做什么好吃的,要等我放到他家,等我一起吃,不仅到村长家,也到别的村民家,有时一晚上要吃好几家的饭,他们把我到家吃饭当作我给予他们的一种特殊礼遇。”

后来,农加贵自己也以是否敢在他的学校吃饭来测试来客对他的尊重和信任度,不过这是后话。

但是,也正是这顿饭,拆除了一直横亘在村民和农加贵之间——不,是横亘在村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心理篱笆,村民因此获得了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农加贵因此获得了村民的极大好感,剩下的故事,就再也没有开初那么紧张和刺激了。

“不敢吃菜,几乎是空腹喝酒,我喝醉了,是农炳康把我背回了驻地。”农加贵说,“哦,对了,现在的麻风村有个名字叫‘落松地’,这个村名还是我给它起的。”

1992年5月,也就是因为孩子那年要报考中学,要填一些表格,其中涉及“家庭住址”一栏,农加贵想,总不能填写“麻风村”吧?于是和村长商量,得给这个名气很大,却没有一个“学名”的山村起个名字,“我对村长说,我们村上面有块地种花生,我们当地把花生叫‘落松’,干脆就把我们这个村庄起名叫‘落松地’,也就是‘花生地’的意思,村长同意了,后来学生考试填表,‘家庭住址’一栏就填‘广南县莲城镇落松地村’。”

而在此前,“落松地”长达35年一直叫做“那边那个村”。

在当地,只要说“那边那个村”,谁都知道是哪个村,只要提到“那边那个村”,方圆百里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村,农加贵印象中,“当时谁家小孩不听话老哭,大人就说:‘再哭就送你到那边那个村!小孩就敢哭了。”

也就是在1992年这一年,经过长达35年的隔离和治疗,象征着阻挡外人进入、阻止山里村民外出的关卡符号的竹竿被撤除了,这意味着,“那边那个村”逐渐成为历史,而“落松地”作为一个村庄,迎来了自己的新生。

农加贵的学生,1982年在落松地村出生的小璇说:“现在的情况好多了,去里面做客的也有,做生意买猪买牛的也有,外地嫁进来的,本地嫁到外地的都有,现在村子里出去的人多了。”

有趣的是,农加贵的儿子农庆刚也被他带到自己的学校读书,今年7月刚从云南警官学院交通管理工程专业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农庆刚说:“我的小学5年都是在落松地小学和村民的孩子一起读的书,有一年下大雪回不了家,我爸又不在学校,我就和同学回他们家去住过了。”

农庆刚回忆说,“我到村民家吃饭不是什么稀罕事。”

“那边那个村”与一个高中辍学生的缘起

“我不去!”

听到叔叔农春盛所说的教书地点,1986年8月的某一天,当时19岁的农加贵不需要任何思考,径直斩钉截铁脱口而出。

叔叔所说的地点是“那边那个村”。

农加贵的头儿,他以前当过工人,后来被送去培训过医疗知识,算是“医院”最有学问的人。

一个叫王建知,以前常在乡村集市卖草药,算是一个懂医懂药的人,卫生局叫他来“医院”,弄些草药用酒泡了给村民吃。

还有一位叫防明礼,虽然也穿白大褂,但实际是在“医院”搞管理。

他们三人的任务就两个:劝阻村民外出的同时给村民发药。

农加贵印象中,他们的打扮令人感到“医院”的氛围很紧张:“他们穿着白大褂,戴口罩,双手戴手套,脚蹬高筒靴,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把药放在医院的窗台上,村民从外面取药,他们也不和村民直接接触。”

农加贵认为,农炳康在动员说服他来当老师教书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反复给我做工作,叫我别怕,我说我还是怕,农炳康就告诉我,酒精可以消毒,他给我酒精,叫我上课之前先用酒精擦手消毒,如果心里还怕,就用酒精兑点水喝到肚里去,就没事了。”

“用酒精防麻风病是可笑的,即便在当时,我也不

相信,但农炳康答应我的几个‘条件’让我心动了。他告诉我,学校不在麻风村,在“医院”,距麻风村有3公里多,我不需要和村民在一起,我和“医院”的3个医生共同居住生活,麻风村的孩子没有病,而且是每天从麻风村走出来读书,我不用去到麻风村。”

农加贵认为,“有医生做伴,麻风村又隔得较远,我不直接接触病人——这些条件使我决定留下来试读看。”

于是,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

当时,这个村子村民——病人及其家属——有280多人,症状明显的病人还有几十人。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用高压锅消过毒才给我”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学生是否会因为生

活在一起的缘故感染麻风病不好说,换句话说,学生中到底有没有麻风病患者,当时没有体检的程序,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农加贵认为,“有医生做伴,麻风村又隔得较远,我不直接接触病人——这些条件使我决定留下来试读看。”

于是,农加贵接下了这个当时每月只有19元工资的“高危”活儿。

当时,这个村子村民——病人及其家属——有280多人,症状明显的病人还有几十人。

“农民给我的补助钱币,用高压锅消过毒才给我”

1986年9月1日开学,第一批学生来了12人,大大的有12岁,小的有五六岁。

学生家长中不少人有麻风病,学生是否会因为生

活在一起的缘故感染麻风病不好说,换句话说,学生中到底有没有麻风病患者,当时没有体检的程序,加上感染这种病的潜伏期长达3至5年,所以,农加贵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稀里糊涂地就当上老师了。

第一次上课前,农加贵还是按照农炳康所教授的“秘方”,用酒精擦手,也喝了点兑水的酒精,给自己壮胆。

孩子们来了。

随着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农加贵的心跳在加速。

他担心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会不会流脓

流血、瞎眼、嘴歪、断肢,跪着走路来学校?”

不一会儿,孩子们进来了,农加贵一看,完全正常,没有那些恐怖的情况。

“他们看上去和外面的孩子一样健康正常,很可

爱,我的恐惧心理在逐渐打消。”

再走到教室门口,距离更近了,他伸头看了看坐

在里面的,孩子,还是没有发现有任何麻风病状,和外

面健康孩子一模一样,才按住忐忑的心,走进了教室。

“但心里还是怕,”农加贵说,“说不怕是假话。”

不过,恐惧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散去,“最主要的是,我待了好几年,没有被传染上麻风病啊。”

另一个因素是,麻风村村民对他的那种“好”。

农加贵除了19元民办教师补贴外,村民又自发集资,每月给农加贵35元作为额外补助,1989年以后,政府

给农加贵的教师补贴增加到了每月45元,但村民依

旧每月给他35元。”文山州总工会副主席杨琪玲说,

“这35元钱零碎得很,面值有元,有角,甚至有分,是村民用高压锅消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农加贵的。”

每次收到这笔补贴,农加贵心里都很热,“头一年

他们每次给我之前,都是用纱布包着钱,用高压锅高

温蒸过,直到第二年我主动提出不再蒸了。”

每月35元的补贴,一直给到1998年8月,农加贵

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为止,一共给了他5040元。

此外,村民还划了半亩稻田种植水稻、1.5亩山地

种植玉米来给他喂养鸡鸭改善生活,“田地全部由村



民帮助栽种收割。”

在农加贵记忆中,落松地的村民为了自己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能使用的手段全使了。

“他们已经发现,下一代要走出麻风村,要去掉‘麻风’的阴影,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为此,凡是涉及办学的事,比如出资投劳修整校舍、招募老师、为孩子升学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从1986年以来,已经三迁,“最早就是和‘医院’在一起,用的教室是‘医院’的一间屋子。后来搬离‘医院’,在距‘医院’约50米,比‘医院’高的一个小山包盖房,作为学校。再往后就直接与‘医院’彻底分开,直接从山谷谷口搬回到麻风村,在村子边建盖学校,这也就是今天的落松地小学所在地。”

即使是今天的落松地小学,在原校址上,校舍已经重建过。

农加贵很感动的是,几次学校校舍新建和迁移,都是麻风村村民举全村之力来参与建设的,“第一次到‘医院’旁边建新校舍,那是一个小山包,必须推平才能盖房子,我先是找了一个开推土机的朋友,同样都说好了,他驾驶推土机来帮我们平地,但到要动工的那天,他因为害怕变卦了,没有办法,村长号召全村的成年人用人力来推掉那个小山包。”

村民有的赶牛来拉土,有的是3个人一组,两个人用绳子拉板车,一个人使劲把板车推进土里,一趟一趟地硬拉,硬是用了1个星期,把小山包推平,然后村民动手,建起了两间教室。

而在此之前,是村民自发集资了8000元用于建校。

“现在的落松地小学校址是1999年迁入的,那时有两间平房,是村民们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屋质量肯定不行,用到2002年,政府出资,才扒掉重建,学校小操场的地坪,也是村民出力平整后再用三合土打起来的,一些病人跪着用锅铲收浆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

“农老师31年只身一人办学,是‘西畴精神’的生动体现”

“体育我还勉强能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没法教的课就是音乐。”

但在学生心中,他很完美。

“对我们很严格,课文背不下来,或者作业写不好,他就不给我们吃饭,但他会故意走开,给我们机会去偷吃。”农加贵的学生小璇回忆道,“下雨的时候学校前面的小河涨水过不去,他就把我们一个一个背过去。”

从2009年教师节开始,黄座富开始琢磨用一切机会,把农加贵的事迹给推出去。

“2010年,我让他带着260多位教师搞‘师德八条’宣誓,2013年3月,又推他为县里的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师德楷模,同年4月,央视七频道《乡约》栏目组来广南拍片子